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1.018

从胡适的“古诗今译”看现代与传统的纠葛

——以《节妇吟》的翻译为中心

李婷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胡适译张籍的《节妇吟》有跋》是创造性翻译,集中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纠葛。首先,译诗转化传统思想,大幅削减封建礼教色彩,反对旧道德,但仍然是折中的转化,体现了过渡时期正在形成的价值观念;其次,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均指向新诗探索,体现出既摆脱又利用传统的复杂关系,“今译”是新诗的实验方式;最后,译诗婉转寄托胡适个人情感,表现了他传统婚姻和自由恋爱矛盾中的微妙心理。从《节妇吟》的翻译可以看出,现代与传统的纠葛于“五四”知识分子而言具有多重意义,“今译”是新旧文化磨合的体现。

关键词:《节妇吟》;现代与传统;新诗实验;纠葛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1-0133-08

《新青年》1920年11月1日第8卷第3号发表了胡适《〈尝试集〉集外诗五篇》,包括:《我们三个朋友》《湖上》《译张籍的〈节妇吟〉有跋》《艺术》《例外》。这五首诗均作于《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之后,写作时间段为1920年8月至10月,按常理不太应该被称之为《尝试集》的集外诗。一般将作品集出版之前未被收进的作品称为“集外”,这些作品由于主观(如故意不选)或客观(散失、遗漏)的原因被排除在外,在时间上还是有被选入的可能。胡适的这五首诗当时并未入选《尝试集》的机会,但胡适仍然冠以“集外诗”,其用意或许在于他认为后写的这五首诗具有和《尝试集》内其他诗一样的价值,应该收录,只是没来得及赶上诗集的出版而已。《尝试集》出版后,胡适多次认真修改,特意请任叔永、陈衡哲、周氏兄弟等人删诗,足见他对此集的重视。颇有意味的是,当这五首诗有机会被收录到再版里的时候,胡适并没有立即去做。《尝试集》1920年9月第二版、1922年2月第三版都未收录,直至1922年10

月第四版才收了《〈尝试集〉集外诗五篇》中的四首,唯独没有《译张籍的〈节妇吟〉有跋》。从发表时的命名、版本的收录情况,可以推测胡适对所译《节妇吟》持有的纠结态度。有意不收录此诗,正说明它可能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节妇吟》译诗发表时,张籍的原文排列在前,胡适的翻译在后,最后是跋,均从右至左竖向排列,末尾署时间“九,八,三〇”,即此诗翻译于1920年8月30日。《节妇吟》平白浅易,似乎没有多少翻译的必要。刘大白就说:“原文本来和白话很相近;胡氏底译,可算得多此一举。”^①汪静之在陈漱琴编《诗经情诗今译》的序言中称:“我从前看见胡适之先生在《新青年》上译了张籍的《节妇吟》,当时我想:《节妇吟》很浅易,也还要翻译,《诗经》更有翻译的必要了。”^②《节妇吟》并不晦涩难懂,胡适为什么还要翻译?胡适在跋文中高度评价了张籍,还说他最爱的是《乌夜啼引》和《节妇吟》两篇,“我在病中读了他的全集,译了这两篇解闷;可惜《乌夜啼引》译的不好;不值得存

收稿日期:2022-07-23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21A0099)

作者简介:李婷(1991—),女,四川巴中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刘大白:《胡适译〈节妇吟〉》,见《旧诗新话》,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20页。

②《汪静之序》,见陈漱琴女士编《诗经情诗今译》,上海女子书店1935年版,第9页。

稿;现在只存这一篇。”^①似乎翻译仅仅是病中解闷而已。实际上,篇目的选择、翻译的处理都体现了深意,胡适仅留存此篇也可见他的满意和看重。

一 新旧思想的碰撞与拉锯

胡适看重张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具有可阐释的现代价值,在附上的跋文中,胡适说:“但是当时做这种社会乐府的许多诗人之中,最有文学天才的要算张籍。张籍的乐府在唐代文学里要算是第一人了。”^②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也对张籍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张籍的社会乐府“上可以比杜甫,下可以比白居易。元结元稹都不及他”^③。胡适推崇张籍的主要原因在其作品蕴含的社会价值和批判意义。张籍关心社会现实,抒写民间疮痍,他的诗特别是一些有关妇女题材的,彰显了对礼教的批判,蕴含着追求人性解放的思想诉求,写出了妇女的悲苦和哀怨,揭露野蛮礼制“吃人”的本质。“五四”文学立场与之遥相呼应。《节妇吟》的原文为: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从文字层面来说,虽然歌咏的是节妇,但也表露了人性。她收下了明珠并且系在衣服里,非常珍视。接下来笔锋一转“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这两句无疑是在夸耀丈夫,虽然明白追求者的心意,自己也心有所动,但依然坚定选择了“事夫誓拟同生死”。可还明珠之时又双泪长流,感慨未能在未嫁时相逢。可见,她心里也萌生过爱意,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最终才站在妇道这一边,断然拒绝了追求者,是不得已而为之。这首诗不只是一味赞美节妇的品行,还蕴含着对节妇的理解和同情,也从侧面反映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因此,《节妇吟》充满了矛盾的张力,主人公表面坚定,内心却十分脆弱、徘徊,感情几经曲折变化。汉代的《陌上桑》也是女子

(罗敷)对男子的拒绝,格调与《节妇吟》完全不同,罗敷并未对使君动心,严辞拒绝,还用很大篇幅夸耀自己的丈夫,借此打消对方的念头,语气酣畅淋漓,表现出一个女子的机智、活泼。《节妇吟》却充满悲情,胡适评价说“此诗的长处在于有哀剧‘Tragedy’的意味。陌上桑的好处在于天真烂漫,但没有哀剧意味”^④。从传统“节操”的意义来说,罗敷无疑比前者更为贞洁。当然《节妇吟》本意并不是抒发爱情,原诗全题为“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是一首用来明志的政治诗。张籍用节妇自比,写得如此悲情,不过是拒人的说话艺术,为了不伤人情面罢了。胡适说:“张籍写了这种境地,却题做‘节妇吟’,便可见他的卓识。张籍做‘妇人问题’的诗,用意都比别人深一层。”^⑤相比诗的寓意而言,胡适更看重诗面上的意义,在《白话文学史》中,他是这样评价《节妇吟》的:

虽然是一篇寓言诗,却算得一篇最哀艳的情诗。……这种诗有一底一面:底是却聘,面是一首哀情诗。丢开了谜底,仍不失为一首绝好的情诗。这才叫做“言近而旨远”。旨远不难,难在言近。旨便是底子,言便是面子。凡不知谜底便不可懂的,都不成诗。^⑥

诗的“面”比“底”更重要,即文学之美重于政治寓意,这也是“五四”时代解读传统经典的潮流,最为典型的是将《诗经》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还原为文学作品。胡适在翻译中摒弃了本意,直接采用文字层面的意思,将之完全转化为一首多情女子拒绝男子追求的爱情诗。虽然大体意思没变,但情感基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适的译文为:

你知道我有丈夫,/你送我两颗明珠。/我感激你的厚意,/把明珠郑重收起。/但我低头一想,/忍不住泪流脸上:/我虽知道你没有一毫私意,/但我总觉得有点对他不起。//我噙着眼泪把明珠还了,——/只恨我们相逢太晚了!^⑦

①胡适:《〈尝试集〉集外诗五篇》,《新青年》1920年11月1日第8卷第3号。

②胡适:《〈尝试集〉集外诗五篇》,《新青年》1920年11月1日第8卷第3号。

③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383页。

④胡适:《〈尝试集〉集外诗五篇》,《新青年》1920年11月1日第8卷第3号。

⑤胡适:《〈尝试集〉集外诗五篇》,《新青年》1920年11月1日第8卷第3号。

⑥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386—387页。

⑦胡适:《〈尝试集〉集外诗五篇》,《新青年》1920年11月1日第8卷第3号。

胡适大幅度削减了原文的封建礼教思想,将之进行改动,刘大白就批评说:“比较起来,译本不但失掉风韵,而且很有合原意不符的地方。”^①刘大白认为第一句应该翻译为:“你明知我有了丈夫,却还送我两颗明珠。”^②“明知”“却”还原了原文中节妇的口吻,认为对方送自己明珠不符合道义。胡适的译文没有转折语气,只是平淡、客观陈述说了这个事实,译文无疑是要抛弃节妇语调。“但我低头一想,忍不住泪流脸上”这句是胡适凭空所加,在此时强调垂泪,证明“我”对追求者充满了恋恋不舍的爱意。刘大白说:“胡氏在原文语气不该流泪的时候,先叫她‘泪流脸上’;到了原文垂泪的时候,却反叫她‘噙着眼泪’起来,表情完全不合了。”^③胡适故意如此,是为了突出“我”的真实情感,联系后续译文,可见流泪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己已婚,而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丈夫而已。原文是决绝的,发誓要和丈夫同生共死,绝对不会弃之而去,立志当一个恪守妇道的节妇。在胡适的译文里,拒绝的原因不再是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不是因为不符合妇道,而是主人公内心的不忍和纠结,“但我总觉得有点对他不起”与原诗中“事夫誓拟同生死”的坚定决绝形成了鲜明对比,刘大白就说此句译文与原文“更觉得相差很远”^④。胡适的改动突出了“我”的主体意识,虽然对追求者心生爱恋,但对丈夫抱有同情,可见丈夫对自己也并不差。这与胡适1918年3月1日翻译的《老洛伯》如出一辙,此诗的最后一节为:

我如今坐也坐不下, / 那有心肠纷
 纱? / 我又不该想着他: / 想着他须是一
 桩罪过。 / 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 /
 我家老洛伯并不曾待差了我。^⑤

“我”与老洛伯之间虽然没有爱情,可是老洛伯“并不曾待差了我”,自己于心不忍。有意思的是,“这首诗首章里的‘Gudeman’一字应译作‘丈夫’,但是胡君把它译成了‘好人儿’”^⑥,胡适这

样译极可能并不是笔误,不称老洛伯为“丈夫”,而称“好人儿”,是有意淡化道德伦理,凸显了虽没有爱情但仍有情义。同理,胡适将“恨不相逢未嫁时”译为“只恨我们相逢太晚了!”并不点明“我”已嫁人,也是故意削弱礼教色彩。1919年3月,胡适在《致〈晨报〉副刊》中指出《晨报》所登的小说《人道主义》是以自己所译的《老洛伯》为底子,胡适不满并批判作者将这首哀情诗演绎为团圆小说,在论述中还列举《节妇吟》进行比较,认为《老洛伯》之所以被推为世界第一首哀情诗是“因为他所记的乃是人生一件无可奈何的悲剧……凡是读了这几句诗的人,决没有不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观念的。中国古诗说的‘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哪里比得上这种真挚高尚的哀情!”^⑦在这里胡适看低《节妇吟》,等后来真正翻译时便自觉向《老洛伯》靠拢,以增强哀情。

原诗“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这两句无疑是在夸耀自己的丈夫,拿追求者和丈夫相比较,认为自己的丈夫十分优秀,借此来拒绝追求者。胡适将之删除不译,认为这两句“还不能完全脱去古诗陌上桑‘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等话的俗套”^⑧,这也是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说的“务去烂调套语”的实践。刘大白则认为这两句“并非无意义的俗套话,决不可以删去”^⑨。胡适不译这两句,用意也很明显。原文里“良人”占据很大的分量,光鲜无比,在胡适的译文里,“我”没有夸耀自己的丈夫,“他”一定程度上却是缺席的,因为主人公内心被追求者占据。

人称的变动也值得注意,将“君”译为“你”,“妾”译为“我”,“事夫誓拟同生死”中的“夫”译为了“他”,整首译诗都是“我”对“你”留恋不已的深情倾诉。在刘大白看来,胡适的译文“不但不能达原文所未达,而且添了一个‘你送我’底‘你’字,生生地把语气隔断,成为两橛了”^⑩。原

①刘大白:《胡适译〈节妇吟〉》,见《旧诗新话》,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22页。

②刘大白:《胡适译〈节妇吟〉》,见《旧诗新话》,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22页。

③刘大白:《胡适译〈节妇吟〉》,见《旧诗新话》,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24—25页。

④刘大白:《胡适译〈节妇吟〉》,见《旧诗新话》,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25页。

⑤Laly A.Lindsay:《老洛伯》,胡适译,《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

⑥朱湘:《新诗评一尝试集》,《晨报副镌》1926年4月1日第1号。

⑦胡适:《致〈晨报〉副刊》,载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02页。

⑧胡适:《〈尝试集〉集外诗五篇》,《新青年》1920年11月1日第8卷第3号。

⑨刘大白:《胡适译〈节妇吟〉》,见《旧诗新话》,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24页。

⑩刘大白:《胡适译〈节妇吟〉》,见《旧诗新话》,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22—23页。

诗多处都将主语省略了,这也是古典诗词的常态,读者在阅读时含义是自明的,并不需要专门指出来。即使翻译成白话文,前文已经交代了人称,后面无需再反复指出,删去也不会产生误会,绝不会出现指代不明的情况。胡适的译文处处都将省略的主语还原出来,乍一看确实有些累赘,但他这样做是为了展现人的独立意识,“我”“你”“他”都是平等的个体,有独立的人格,不存在隶属关系。原诗中女子的个人主体性被伦理纲常所淹没,没有个体的自由、个性、人格,也不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妾”只是“夫”的附属品。在译诗中主人公的主体自我得到了彰显,“我”有了个体独立精神,解构了原诗中传统的夫权文化。“五四”时期,无数青年开始觉醒,他们大声喊出“我”来,再也不愿受封建家庭关系和伦理观念的束缚,这也鲜明地反映在了文学艺术中。人称代词(特别是单数人称)大量进入新诗,这是民主与科学、追求个性解放、独立平等的产物,其中蕴含着个体的自觉,意味着从封建的集体主义转向现代的个人主义人生观。

刘大白逐句批评了胡适的译文,认为与原文相差甚大,并且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他的译文更接近原文,推理性更强,情感色彩较为淡漠,“我”很理性地看待“你”的追求,拒绝是因为自己已有丈夫。谢冰莹曾说:“刘大白先生和胡适之先生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五四’时代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功臣;但他们把公私分得很清楚,在胡适译《节妇吟》一文里,他很客观地,很坦白地把适之先生的译诗哪些地方不妥,哪些地方是多余的,他都一一指出,把原诗和译诗同时写出来,再加上自己的译法,像这种作风,只有度量宏大的适之先生才能受得住;也只有天真坦白的刘大白才敢大胆地这样写。”^①刘大白提倡白话,是白话新诗的主力军,从这点来看他和胡适同为新文化阵营,胡适还给他的《白屋文话》作跋,并称赞他是“痛恨死文学而提倡活文学的一个急先锋”^②。刘大白站在纯粹狭义的翻译立场来挑错固然“客

观”,但没有看到新旧文化及思想观念转化的合理性。

类似的批评之声也不少,王无为逐句详细分析了胡适的译文,认为胡适的翻译出现了很多错误,是“不明这诗的历史”,认为胡适的翻译大大伤害了“温柔敦厚”,原文中双方的人格都很高尚,但译文使得诗中的女主人公道德上有了瑕疵。胡适译文要强调突出的,正是王无为所强烈批评的。王氏认为“胡适拿着民国九年的眼光,去观察唐张籍的诗”^③,虽然是批评之语,却也道出了胡适的译文抛弃了原文封建礼教思想的事实。王氏最后得出结论说:“至以白话而改文言诗,我是极其怀疑的。我觉得文言有文言的味,白话有白话的味,这两种味,截然不同。在适当范围内,以白话改白话诗,以文言改文言诗,是可以的。倘用白话改文言诗,或用文言改白话诗,都不能不有方枘圆凿,格格不入的现象。”^④直接把文白翻译的价值否定了。胡怀琛认同王无为的观点,认为“即便是文言诗有一种地方,可以白话译出来的;也有一种地方是译不出来的。如一定要译,剪裁也可以;却要好,不可弄巧成拙”^⑤。

刘大白、王无为等人对胡适译诗的批评停留在翻译层面,讨论的标准是“信”,并没有切中胡适本意。他为什么这样翻译、要达到什么效果,也是应该关注的问题。《节妇吟》的译文大幅消减了传统贞操观念,体现了对旧道德的否定,张扬了思想觉醒、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合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思想,表现之一就是追求妇女解放,打破女性身上传统伦理纲常的枷锁,显在标志之一就是贞操问题的讨论。以《新青年》为中心,周作人翻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⑥、胡适《贞操问题》^⑦、鲁迅《我之节烈观》^⑧等,在社会上掀起了对贞操的关注和对封建文化的批判。胡适提出男女平等、自愿的贞操观,并认为“夫妇之间若没有恩爱,即没有贞操可说”^⑨。他的文艺实践也与之一致。译诗集中体

①谢冰莹:《刘大白》,见《谢冰莹文集(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②胡适:《序跋二 跋白屋文话》,见刘大白:《白屋文话》,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197页。

③王无为:《改诗的问题(一)》,《新的小说》1921年第2卷第4期。

④王无为:《改诗的问题(一)》,《新的小说》1921年第2卷第4期。

⑤胡怀琛:《改诗的问题(二)》,《新的小说》1921年第2卷第5期。

⑥《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第4卷第5号。

⑦《新青年》1918年7月15日第5卷第1号。

⑧《新青年》1918年8月15日第5卷第2号(署名“唐俟”)。

⑨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1918年7月15日第5卷第1号。

现了新旧思想的碰撞,交锋的结果是温和折中的呈现,而不是激烈反对、完全自由,这显示出传统与现代的拉锯。

二 既打破又利用传统的新诗实验

胡适译《节妇吟》时正值病中,这段时间他有很多闲暇,这为他集中思考诗艺问题提供了时间保障。他译此诗并不仅是为了“解闷”,而是有着探索新诗的目的。从他觉得《乌夜啼》译得不好故未留存就可看出,胡适的译诗是慎重的实验。胡适始作白话新诗时就遭受了很多嘲笑和讽刺,《尝试集》的出版引起很大反响,有很多批评之声。胡适在《〈尝试集〉初版自序》中对自己的写作也多有反思,新诗如何才能脱去旧诗的影子?该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关系?“诗体大解放”之后该如何表现诗美?这些反思关涉宏观层面对诗学困境的思考,也有哲学层面对诗歌美学的探究,既包含了思想启蒙意愿,也体现了关于传播经典的思考^①。对这些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胡适用《节妇吟》的翻译进行了自我回应。

在内容上,新诗发轫阶段尤其注重个性解放,爱情因此成了文艺的主要题材。胡适所译两首张籍的诗抛却本意不论,均与爱情相关,《乌夜啼引》写的是妇女夜闻乌啼预感丈夫将被赦免,胡适认为自己译得不好,所以没有留存。从主题上说,《节妇吟》更能体现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也更好将之转化为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翻译对象的选择有着明显的主观倾向,他刻意选择爱情题材并用现代的思想观念来阐述,为的是符合新诗的价值立场。刘大白、王无为等人对之的批评停留在翻译的对错上,站在他们的角度,当然也有合理性,但忽略了文化转化。胡适的确是拿现代人的眼光来打量古诗,这是胡适有意“误读”,他故意去其封建思想糟粕,用现代人的思想情感来解读,专门向着有利于现代文化建设的方向阐释。古典诗词中有许多价值观念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在翻译中进行转换是情理之中。这种创造性的改动剔除了原诗与现代观念不能相容的成分,使之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在古诗今译中进行改编是

常有现象,因为这一行为的目的不在知识普及,而是新诗创造。1925年,胡适就作了一首古今结合、以今释古的诗,名为《瓶花》^②。这首诗在《现代评论》发表的时候前半段为宋代诗人范成大《春来风雨无一日好晴因赋瓶花二绝》之一的原文罗列,后半段为胡适所作的新诗。胡适所作与范成大原诗构成了古今互释关系,是胡适对范成大诗的创造性今译。胡适将范成大的咏物诗演绎为对爱情的歌咏,主题彻底发生了改变。译诗委婉优美、情感丰富,塑造了一个为了亲近心上人而置困难、荣华于不顾,并为了爱情甘愿默默无闻凋谢的人物形象。

在形式上,今译打破了传统的形式,可视之为新诗。刘大白变相承认了这首诗的新诗价值,认为胡适的翻译若是独立地自成一首诗,还算过得去,但若看作《节妇吟》的翻译,就太逊色。有意思的是,这类的批评话语也常见于其他的今译中,如郭沫若翻译自《诗经》的《卷耳集》就被人认为是作诗而非译诗^③。之所以可以被认为是新诗,因为采用的是自由的形式,“新诗和旧诗,是从形式上分别的”^④。胡适的译文使用白话、句子不拘长短、不讲对仗,具有新诗的形式意义。吴文祺在早期新文学研究的重要史著《新文学概要》里,指出早期的白话新诗在形式上存在一种相反的现象,即“不脱旧诗词的影响”和“有意要摆脱旧诗词的影响”。前者是新诗人无意的,因为他们在旧诗词里浸染很深;后者是有意的,“等到作者有意要屏除旧的词藻时便不免矫枉过正”^⑤,他随即举了胡适译《节妇吟》为例。胡适的译文并不完全自由,前四句、七八句字数等同,排列整饬。整首诗几乎都是“我”与“你”的情感较量,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封闭回环结构,只有第八句出现了第三人称的“他”,短暂打破了这个结构,很快又回到“我”与“你”的拉锯之中,加强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纠葛。在韵脚的使用上足见匠心,每句末尾的字依次为:“夫”——“珠”——“意”——“起”——“想”——“上”——“意”——“起”——“了”——“了”。刘大白评论说胡适被押韵所累,认为译文出现的问题皆是押韵的缘故,最后得出结论说译诗不宜用

①王祎灵,方维保:《20世纪20年代新诗集“诗体序”的主旨、成因及影响》,《中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

②《现代评论》1925年11月14日第2卷第49期。

③梁绳祎:《评郭沫若卷耳集》,《晨报副镌》1923年12月6日—7日。

④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少年中国》1920年3月15日第1卷第9期。

⑤吴文祺:《新文学概要》,亚细亚书局1936年版,第94页。

韵,因为用韵容易改变原本意。形式确实会对内容造成束缚,但胡适改变原意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形式美,而是对现代理念的阐发。要从新诗用韵的角度来说,刘大白本人就是代表,他的《田庄来》《卖布谣》等就采用歌谣形式,极具音韵美。刘大白还有专门探讨新诗格律的论文《中国诗的声调问题》《新律声运动和五七言》等,他并不反对新诗押韵,也不主张完全废除旧诗的影响,他对胡适译诗用韵的批评不过是认为损害原本意罢了。胡适意在建设新文学,刘大白意在旧文学的还原,二人根本构不成一个层面的对话。

新诗发轫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打破传统束缚,如何才能做到呢?翻译就是一种方法。学界普遍认为对国外诗歌的翻译是新诗诞生的最大动力,实际上,翻译对新诗产生的影响还存在于古今维度,新诗通过“今译”的方式与民族传统发生关联。

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胡适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尝试实验,他古诗今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探索新诗。胡适直接的“今译”虽不算多,但却有着重要意义,暗示了表面上激烈反对旧文学的文学革命其实并未抛弃传统,不过是一种革命策略而已。胡适很多新诗其实都有文言诗白话化的色彩,也就是用隐形的今译方式来写作新诗。叶维廉就指出胡适的《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不过是文言诗的白话化,只在原诗的基础上删减部分字词,意思没有任何改变,但诗的样式却变成了一首不太严格的律诗了^①。胡适对自己哪些诗是“旧诗的变相”“词曲的变相”(《尝试集》再版自序)也有自知之明。

胡适翻译的《节妇吟》开创了新诗探索的另一方向,使得今译成为新诗的来源之一。虽然在胡适之前闻一多就于1920年7月今译了韩愈《南山诗》前28行,题为《〈南山诗〉(古诗今译)》(收入手稿诗集《真我集》),但当时未公开出版、发表,没有产生影响力。胡适的翻译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启发了古诗今译的兴起,很多诗人、学者陆续投入其中,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郭沫若的《卷耳集》(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这本新诗集就译自《诗经》。此外,1924年10月3日,鲁迅将张衡的《四愁诗》创造翻译为《我的失恋——拟古的新

打油诗》^②。1924年左右,徐志摩“古词今译”了李清照《漱玉词》12首^③。1929年5月15日,郭绍虞作《新诗的前途》^④一文,认为练习新诗写作最好的办法是翻译,向中国古典诗词学习的最好的路径就是翻译古典诗词,他还列举并高度评价了燕大国文系学生韩迪厚翻译的李煜词作为例证。1930年代兴盛《诗经》今译,如陈漱琴的《诗经情诗今译》(上海女子书店,1932年)收录的就有储皖峰、顾颉刚、魏建功、汪静之、刘大白、钟敬文等人的翻译。还有吕曼云《三十六鸳鸯(国风的恋诗)》(黎明书局,1933年)、陈子展《诗经语译》(上海太平洋书店,1934年)、纵白踪《关雎集》(上海经纬书局,1936年)、张小青《野有死麕》(上海群众杂志公司,1937年)等。这些作品延续了胡适开创性的今译探索,在内容和形式上为新诗建设服务,这一传统在新诗发展史上并未断裂,在今天仍有不少诗人尝试通过“今译”进行新诗的创造。

作为白话新诗的倡导者,胡适为什么会想到通过古诗今译的方式来探索新诗写作呢?首先,这一代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学熏陶,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这使得他们在进行新文化、新文学建构时会很自然地利用传统资源,即使在显意识层面有意要摆脱传统,但潜意识里传统的影响依然存在。胡适就擅长写作旧体诗词,对古典文学也有深入的研究。其次,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主张借用了美国意象派的宣言,胡适等人早期的白话新诗也明显打上了美国意象派的痕迹,而美国的意象派又是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就有中国古诗译本《华夏集》,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就有中国古诗译本《松花笺》。新诗的倡导者们无法不接受这样的事实:白话新诗急于从古典诗歌中挣脱出来,但他们学习借鉴的英美意象派却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这可能也启发了新诗试验者回头重新审视民族传统,通过翻译向古典诗词学习。最后,古典诗词只有通过翻译才能实现新诗体的建立。胡适提出“不摹仿古人”(《文学改良刍议》)并强调“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谈新诗》),陈独秀提出“推倒陈腐的

①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28页。

②载《语丝》1924年12月8日第4期。

③陈从周:《徐志摩白话词手稿》,《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

④郭绍虞:《新诗的前途》,《语文通论》开明书店1941年版。

铺张的古典文学”(《文学革命论》)等,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决定了新诗的成立不能再直接模仿古典诗词,只有间接地学习,因此今译成为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化选择。又或许,在今译的背后,隐藏着新文学家的另一种“革命”,即与反对新诗的复古、守旧派较量,通过今译来证明白话不仅能写诗,古诗能表达的内容,白话同样可以表达,并且还可以传达出与新时代合拍的意蕴。

三 托译言情的婉转抒发

胡适的译诗具有抒发个人情感的一面,借译诗消心中块垒。

众所周知,胡适的婚姻是家长包办,他1904年与江氏订婚,此后常年在外国游学,与未婚妻从未谋面,直至1917年结婚。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胡适虽信守传统旧式婚约,但也有多次自由恋情,订婚之后、结婚之前在美国留学期间就与韦莲司相互爱慕,还与陈衡哲有一段令人遐想的“情缘”。与“小脚”村姑江氏相比,知识女性韦莲司无疑更契合胡适的精神世界,但胡适有婚约在身,内心充满了两难。1914年11月3日,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记载,韦莲司问他:“若吾人所持见解与家人父母所持见解扞格不入,则吾人当容忍迁就以求相安乎?抑将各行其是、虽至于决裂破坏而弗恤乎?”胡适回答说东方人是前者,讲究“为人的容忍”“甘心为爱我者屈”,而西方人是后者,“不可为人屈”。有意思的是此篇在《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发表时,并没有点出这位女士是谁,只说“某女士语余曰”,但在1939年出版的《藏晖室札记(卷七)》(亚东图书馆)中《二二“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里则点明“韦莲司语余曰”,并且还说明了自己的选择:“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①此文在《新青年》发表时,新文化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作为主要倡导者,胡适当时不可能公开表示选择服从父母,何况是在《新青年》的阵地上。

但“甘心为爱我者屈”,一个“屈”字就透露了并不甘心,是委屈自己,内心是不情愿的。胡适对包办婚姻并不是欣然接受。1918年5月2日,胡

适在写给胡近仁的信中承认:“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②胡适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是出了名的孝子,与江冬秀的婚姻也是不忍违背母亲的心愿。

胡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表露真实心迹,婚后三个月后即1918年3月1日他翻译了《老洛伯》,诗歌中,“我”不能与心上人厮守,为家庭缘故只得嫁给老洛伯,但心里依然想着恋人,可是老洛伯是个好人,待自己也不差,“我”为了报恩只能放弃恋爱的自由。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新婚杂诗》和《老洛伯》同发表于《新青年》1918年第4卷4号。1919年2月胡适还翻译了《关不住了》^③,原诗本题为“Over the Roofs”(在屋顶上),又为“May wind”(五月风),但胡适并未采用直译,而是意译为《关不住了》,透露出心中的爱意是无法被任何东西所束缚,暗示了他向往自由、想要挣脱婚姻束缚的心态。1919年胡适还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发表了争取婚姻自由的话剧《终身大事》,体现了鲜明的反封建主题。1920年11月胡适发表《节妇吟》的翻译,含泪拒绝爱情是因为觉得对不起人。胡适不忍母亲伤心,也不愿辜负未婚妻多年的等待。1921年8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一次与高梦旦关于自己婚姻的谈话:“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是社会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④胡适所阐释的理由是“不忍伤几个人的心”,这与他翻译的《节妇吟》中“但我总觉得有点对他不起”、《老洛伯》中“我家老洛伯并不曾待差了我”何其一致。胡适在《四月二十五夜》^⑤一诗中抒发了自己被月色撩拨思绪,“对着

①胡适:《藏晖室札记(卷七)》,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443页。

②胡适:《致胡近仁》,参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③1919年2月26日译,载《新青年》1919年3月15日第6卷第3号。

④《胡适日记全编(三)》,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页。

⑤《新青年》1918年7月15日第5卷第1号。

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 /我待要起来遮着窗儿,推出月光,又觉得有点对他月亮儿不起”,窗外的月色象征着内心的情思,情感是关不住的,要关了窗子遮住月光,也“有点对他月亮儿不起”。这种惭愧之感一直萦绕着胡适,使他在自由恋爱与传统婚姻中进退两难。胡适渴望自由恋爱,在婚前、婚后都有过刻骨铭心的恋情,但他始终未违背婚约也未与原配离婚。1936年5月19日,胡适作《无心肝的月亮》,在诗前引用:“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整首诗也是这两句的创造性翻译。胡适通过这首诗暗示自己跳不出原来的轨道,不能为爱情停留,表达了内心的妥协与无奈。胡适对古典诗词的“翻译”往往寄托个人幽思,旧道德无疑与胡适的新思想相冲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不可能公开表示站在传统伦理这一边,这也与他宣扬的理念相抵牾。胡适对《节妇吟》的翻译转化不仅是新文化的要求,也是他内心冲突的努力和解。《节妇吟》的翻译之所以最终没有被选入《尝试集》,并不是此诗缺乏新诗体的意义(实际上集子里很多诗都有旧体诗词的鲜明烙印,还有很多直接是旧体诗词),也不是因为《节妇吟》思想不现代(译文已大幅摒除原文的封建礼教思想,通过极富哀情的转化展

现了人性的觉醒),也不是因为此诗是一首翻译诗(实际上集子里有很多翻译作品),可能更多的是胡适出于个人情感的顾忌。

结语

“现代”“传统”之范畴是文学、文化、社会价值观念多层面的胶着。以《节妇吟》为中心,可以看出古诗今译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反对旧道德、建立新道德的价值诉求;二是通过翻译探索新诗;三是个人情感的曲折抒发。与之相应,也在这三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纠葛之态。首先是新旧思想的碰撞与拉锯。译诗大幅削减了传统思想,但未完全删除,而是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合理”转化。态度是温和的,没有激烈批判,仍有所保留,体现出过渡时代正在形成的价值观;其次,译诗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实现了新文学的创造,对传统既没有全盘否定也没有全盘认可,体现出既摆脱又利用传统的复杂关系;第三,通过翻译来表达不便直言的心声,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在西学影响下的两难心理。总之,现代与传统的纠葛具有多重价值,凝结了公域和私域的深度纠缠。翻译作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也是对新旧冲突的一种调试、弥合。

Analyzing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from Hu Shi's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Poems:

With a Focus on the Translation of *Jiefu Yin*

LI T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Hu Shi's *Translation of Zhang Ji's Jiefu Yin with Postscript* is a creative translation, which embodies three aspects of modern and traditional conflicts. Firs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poem transforms the traditional thoughts, greatly reduces the color of feudal ethics, and opposes the old morality, but it is still a compromise transformation, which embodies the values being formed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Secondly, it points to the exploration of modern poetry at the dual level of content and form, which reflects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getting rid of and using the tradition. Modern translation is an experimental way of modern poetry, 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etry. Thirdly, the translated poem expresses the subtle psychology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and free love. From its transl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ntanglement of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has multiple meanings for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modern translation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cultures.

Key words: *Jiefu Yi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modern poetry experiment; entanglement

(责任校对 朱春花)